

《唐鉴》与禁书试析

丁永玲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唐鉴》作为儒家文化的优秀范本,在北宋徽宗时期却被打入禁毁之列,这其中不但折射了一定时代的文化取向,也反映了我国上层阶级统治的残酷性。论文从《唐鉴》作为禁书谈起,探求《唐鉴》被禁缘由的基础上,并将对我国禁书形成的原因作一定分析。

【关键词】 禁书;《唐鉴》

【Abstract】《Tang Jian》is the excellent model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culture. Yet it was banished to be forbidden and ruined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not only refracts the culture orientation of specified age, also makes known brutal qual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upper class of our country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begins at 《Tang Jian》, a banned book, pursues the reason why《Tang Jian》was forbidden, analyses the cause for taking shape of banned book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Banned book; 《Tang Jian》

人类在史前的长河里缓慢地行进着,从远古进入纪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也都积累着自己的文化遗产。随着社会形态的“沧海桑田”,有的变化、更替着,有的消失了、死亡了;有的古树常青,弥漫着清幽的馨香;有的则已经解体,融化进入其他的田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部分的国书禁毁文化,呈现出了格外厚重而复杂的形态。

1 禁书文化与《唐鉴》

1.1 禁书文化

禁书,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定环境下被禁止传播的书籍。其实,广义上的禁书与我们根据个人的自主的意气判断的好书、坏书不同,是指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譬如政府机关、司法部门、教会、道德和文化组织,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以及其他强制性的行为,禁止刊印、发行、进口、流布和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被全部禁锢,有的被部分禁锢,有的甚至被烧、被毁。其中,完全被禁的书籍称为“全毁书”,部分被禁之书称为“抽毁书”。禁书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遗产,目前也已经有很多专家开始研究这一曾经被尘封却饱含意蕴的文化范畴,如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禁书大观》、1994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禁书大观》等;另外,还有很多知名学者发表文章,逐渐开始挖掘这一时间隧道中的文化内存。

在世界禁书历史上,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焚书坑害的对象重点也有所不同。古代中国讲求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触犯统治者的书籍、儒生就率先被归于镇压之列;而欧洲中世纪崇尚宗教,讲求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而触犯神权的

自然科学家及其著作首先要被处以焚死之刑。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大肆毁书,漫长的历史中牺牲了多少有志之士,消失了多少文化精华,阻碍了几十年几百年历史的前进?这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文化史,也是一座值得挖掘的文化宝藏。

1.2 《唐鉴》及其被禁

《唐鉴》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所论上起高祖李渊,下至唐昭宗李晔,把近300年的唐代历史中事可为法戒者撮取大纲,系以论断。全书共12卷,后经吕祖谦注,析为24卷306篇。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参与其事,专门研究唐代盛衰兴废单独撰写唐史专著。《唐鉴》实为《资治通鉴》的副产品,于元祐元年完成。书中儒家思想与主张随处可见——强调礼仪教化是立国之本,强调君臣之分,主张任贤用能、纳谏杜谗,蕴含了许多精辟的史学观点。即使在当今信息经济时代,仍可谓史学评论界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进步史学思想的精华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历史。《唐鉴》全书中施于唐玄宗的笔墨颇多,这主要是由唐玄宗在唐朝历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作为唐室由盛入衰的关键人物,唐玄宗的观点行为自然应该得到历史的关注。从即位之初不忘太宗治迹,虚心纳谏,任用贤臣。开元后期,玄宗罢免了敢于直谏的张九龄到沉溺于安逸生活并任用安禄山,还有在国家经济危机之时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把唐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后来,杨国忠专权肆虐,权臣相互倾轧,激发了导致唐朝衰败的安史之乱。

《唐鉴》中,作者对玄宗一朝兴废之事,从经济凋敝、用人失当、生活奢靡、政治腐败、兵权旁落、杨氏专权、权臣倾轧等各个方面逐一分析,运用发展的观点,将开元到天宝之间的历史沧桑变化勾画得清清楚楚。

(2) 坚持辩证的观点。对唐朝不同时期的经济、军事以及用人政策上进行分析,坚持辩证的观点,从利弊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不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客观评价,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比如,同时经济政策,唐朝初期的均田、租庸调制受到了赞扬,而对以后一段时期所实行的刻剥聚敛等不利于国富民强的政策进行了批驳,着实体现了在分析历史问题时所采用的辩证观点。

(3) 运用比较法进行详细剖析。在论述到贞观四年的一段时,通过正反两方面对隋文帝和唐太宗进行比较说:“是以隋文帝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道,而此得其道也。”后面还比较了唐玄宗个人的前后变化进行比较,看到了其腐败变质的一面,说明一个人是可以走到自己的反面的,也进一步在比较中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便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4) 继承了优秀史学的民本观念。“有国者不忧百姓之贫,而疑财之有余,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劳,而疑其力之有余,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针对不同史实,都以民为先,从百姓的角度开始思考,强调了人民是决定君主命运、社会安定与国家兴亡的根本。

《唐鉴》中还蕴含有许多先进思想,比如勤俭治国等。不论是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写作目的和实际内容上来讲,都脱离不了当时社会的踪迹,完全符合传统道德规范。但是1103年4月,宋徽宗下令:“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缜《东斋纪事》等印版,悉行焚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以当时著名人物的署名著作作为焚毁对象的焚书事件,开启了后代禁书历史的又一篇章。其中,内容思想十分符合正统完全遵循儒家思想符合皇权统治的《唐鉴》也没有逃脱被焚毁的命运。

2 《唐鉴》被禁原因初探

从作者来看,是党派之争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以人废书”的首例。范祖禹,字梦得,成都华阳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是北宋倡导义理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叙史、论史,目的是要陶铸历史于一理。他中进士之后在资州龙水县(现资中县龙结镇)当过两年县令,颇有政绩,司马光十分赏识他的人品和才华,将他举荐入朝,共同编修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范祖禹比司马光年少22岁,两人的师友之情异常深厚。范祖禹非常感激司马光的知遇之恩,“从游温公十五年”,于仕途“不事进取”,专心致力于《通鉴·唐纪》长编的撰写工作;而司马光对范祖禹也非常赏识,充满着信任,“温公家事无大小,令先生商之,虽公子康不敢专也。”另外,司马光和范祖禹的叔祖范缜之间也有很深的友谊,在某种程

度上司马、范两家可以算得上世家之交了。虽然在《唐鉴》中司马光和范祖禹在唐史的评判标准、编年系事书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他们始终是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上,持有相同的治国治家观点,同属于旧党派人士。神宗用王安石新政,司马光等旧党派人士极力反对,苏轼还作诗二十余首讥讽当时所推行的新政,“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寓意执政过程中的新意层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得不到片刻休息等。随后,苏轼等二十二人受到贬斥,史称“乌台诗案”。从此开始,两党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唐鉴》即使是一本意义不菲的著作,也因为范祖禹,因为司马光,因为旧党派反而惨遭劫难。

从内容来看,《唐鉴》体现的是旧党派的思想观点,在那个变法派与保守派轮流走红的时代必然会在某段时间违背统治者的意愿而遭到禁毁。《唐鉴》里面所体现的儒家伦理道德、君臣父子之礼完全是中国古代几千年统治的法宝,是一部标准的儒家思想著作。但是,在人才观、财政观、义利观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思想,与新法派思想存在着一定差异,体现了两者的意见向背。针对唐高祖时期的均田制,《唐鉴》里说“立法者,未尝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者不能自立也。贫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赋敛重而力役繁也……后之为治者……唯省其力役,薄赋敛,务本抑末,尚俭去奢,占田有限,困穷有养,使贫者足以自理,富者不得兼之。此均田之本业”等等。

从外界环境来看,是当朝皇帝为了掩饰自己昏庸无能统治的直接结果。北宋晚期最高统治集团的结构已由从前皇帝加大臣的局面蜕化为昏君加佞幸的格局,而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难以肩负天下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昏君加佞幸的格局上层士大夫诚然应以宰相为代表,奸臣蔡京为相,政治腐败,国势衰弱不堪。台谏官中还有一些直臣,而在徽宗所任命的12名宰相中无一人堪称贤相。当时朝中大臣和在野名士,群起抨击蔡京,议论朝政,蔡京乃假借徽宗之手,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打为“元佑党人”,生者罢官放逐,死者削去官职爵位,并下令全国,严禁这些人的一些著作流传。

3 我国禁书的社会因由浅析

禁书,实际上就是对自由与异端思想的排斥禁锢。中国的封建社会以禁书开始,同样以禁书结束,其历史的漫长以及具有戏剧性的首尾呼应,的确是发人深省的。中国古代的禁书标准,大致来说有王朝观念、皇权观念、种族观念、宗教观念、正统观念(官方思想)、道德观念、党派观念与权者观念。

3.1 政治原因

禁书作为一种人为现象既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政策,又再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形态以及伦理标准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在古代,图书是人民表达思想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因而,查禁图书就是统治者进行文化思想统治最容易收到成效的有力措施。随着政权的

变更,文化政策的变化甚至派系的倾轧都有可能出现禁书现象。所以政治制度、文化政策是禁书的主要原因。这方面可以详细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封建帝王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禁书措施。不管图书内容如何,不管是原来尊崇的法学还是儒家学派著作,只要有一点可能激发百姓的思想威胁到帝王的政治统治,就会被禁毁。始皇帝可以说是我国禁书的鼻祖,秦吞并中原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因儒生淳于越等人不满朝政,主张师古,诋毁秦始皇,引起皇帝不满,秦始皇采用李斯建议,为打击师古势力,下令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对除秦史以外的六国史籍全部烧毁,即使普通百姓,也不允许私藏《诗》、《书》等儒家典籍,仅留下为数甚少的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性的图书。史学界评论这次行动为“幼稚的残酷”,它首开官方禁书之先河,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耻辱。

另外,禁书活动还和不同君王的心理、所主张的思想派别以及兴趣爱好有一定联系。西晋首禁讖纬天文图书,西晋统治者认为,谈论讖纬天文的图书对它的统治极端不利,遂下令禁绝私藏天文星占图书,代之而起的是西晋玄学的风行。用客观的眼光来分析,被禁毁的图书中有些虽然并不威胁当朝统治,但是由于个人感性理解和理性认识程度的不同,会认为他们“悖逆”之倾向,这样必然会有导火索引发被禁的命运,此类现象即使在清朝较为开明的三代皇帝身上也没有例外。

第二,封建统治者为了掩饰自己的虐民暴政或者是卖国行为等反面影响,也会利用禁书、毁书事件,以掩人耳目。从宋代开始,文治的阴影日渐昭彰,到南宋时期,对人们文化思想的控制更加严厉,除严防百姓造反外,还害怕读书人评议朝政。当时就出现了查禁以《江湖集》为代表的私人著述活动,大量查绝记载史事之书,造成了大量下层知识分子著书失传。

第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以后,大肆利用禁书、毁书活动来钳制民族意识的发展,维护自己的统治。乾隆皇帝为了标榜其“文治”功绩,加强思想控制,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为了将其中对清统治者不满,能引起人们对明朝好感或怀念或与程朱理学相诋毁的书全部销毁禁绝,即使被收录的,若认为有违碍之处,也要加以“抽毁”,就是因为编纂这部当时被称之为“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的叹为观止的煌煌巨著,累计遭禁的图书有2400余种,是中国古籍的最大灾难,同时也是历史上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迫害最残酷的一页。

3.2 佛教和道教两者之间的长期斗争也会导致焚书事件的发生。

佛教诞生于印度,西汉末期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迅猛发展。而中国的本土宗教,东汉时期得到发展。两教之间的斗争从道教产生初期就开始而且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道教思想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与儒家结成联盟,在

封建帝王的庇护和士大夫们的支持下,逐渐在斗争中处于优势,余之相对应的佛教则处于不利地位,成了斗争的主要矛头。北魏太武帝时期和北周武帝时期,因为势力过于强大的佛教影响了国家税收和兵员补充等,废除了佛寺,拆毁佛像,禁除佛经,强迫僧尼还俗等等。

3.3 礼教原因

我国古代讲求风化,要求人们要恪守礼仪道德的一套规范,如有违反将会受到家族的审查以及社会的唾弃。明清以后,小说、戏曲大量出现,对于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消遣娱乐带来积极作用,但其中也确实有一部分图书,内容主要是“琐语秽词”,影响世风。所以内容淫秽,格调低下的图书就成为禁书的又一大类。像《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但由于书中有作者对主人公的性心理、性行为等的恣意描写,与明后期社会风气的堕落有很大关系,给读者带来很坏影响,从一出世就成为清朝以来(直到现在)的禁书。

在清代,小说、戏曲中确有不少思想不健康的作品,这种内容的书籍会导致满族人尚武、淳朴习俗的锐变,故而把其列入了禁毁范围。另外,因为小说、戏曲的情节中往往包含许多政治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例如小说《说岳全传》就是因为演述了宋、金交兵的内容而冒犯乾隆的种族意识而被查禁的。最后,小说便于传播,戏曲则便于结社、聚众,这些因素都能威胁到封建专制统治的安全,理所当然的会被列入激励禁毁之列。

禁书是中国古代政府对传媒管制最富有特色的一种管理控制手段,与口语管制、文字管制一起构成了对传媒实行的专制独裁,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阴暗。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管制的领域也在不断发展,管制手段也随着封建政府政治经验的积累而完善成熟。但是,封建社会也因此走上了灭亡的道路,给世人留下的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惊叹。

参考文献

- 1 安平秋.中国禁书大观.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 2 邓伟氏,胡锦成.书厄与中华文化之兴废.佳木斯: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6)
 - 3 范祖禹,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 4 李寿.古今中外名书禁书大观.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
 - 5 王彬.禁书?文字狱.杭州: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 6 汪高鑫.司马光范祖禹唐史观点不一致论.合肥:安徽史学,2000(1)
 - 7 温哲军,文畅平.从《唐鉴》看范祖禹的史学思想.惠州:惠州大学学报,1998(9)
 - 8 余悦.世界禁书大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 (作者信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邮编:430000.收稿日期:2004-06-18.)

编校:王陆军